

剑桥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述论*

谢 辉

内容摘要: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,历经朱为弼、丁日昌、刘承幹收藏,于1949年流入英国,今藏剑桥大学图书馆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的南京图书馆藏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,实际应是周中孚为上海藏书家李筠嘉编纂的一部藏书志。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有多处文字可正刻本之误;其在作者仕履方面与刻本之不同,可以考见《郑堂读书记》部类排列和佚稿之情况;稿本中的增删之处,也可考见《郑堂读书记》之撰述历程及宗旨。

关键词:剑桥大学图书馆 《郑堂读书记》 周中孚 李筠嘉 嘉业堂

一、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的流传

周中孚于清道光十一年(1831)去世,有子二人,其次子将周氏藏书与手稿全部出售,其中即包括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(以下简称“《读书记》”)。此前研究者谈及此事,多误认为出售手稿者乃周中孚弟周联奎之次子,如樊文亚即说:“周中孚无子,只有一个女儿,身后便将《郑记》和他的生平藏书及手稿交给了弟弟周联奎保管。但是,周联奎的次子,却趁机将手稿及藏书卖了出去。”^①此实为误读戴望《外王父周先生述》所致。戴氏文曰:“妻任孺人,先卒,生女子子一……妾生子二……没时,教谕君客山东,其次子不肖,以先生藏书及草本鬻诸他氏。”^②可见周氏妻生一女,妾生二子,售书者乃妾所生之次子,前后文意甚明。周氏二子后皆不知名,冯登府谓“子二,予未识”^③,盖非学问中人。

《读书记》稿本售出后,先归朱为弼所有。戴望《外王父周先生述》谓“朱比

*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梵蒂冈藏明清天主教文献整理与研究”(14ZDB116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樊文亚:《〈郑堂读书记〉文献学价值初探》,西北大学硕士论文,2010年,第5页。

②(清)戴望:《外王父周先生述》,《郑堂读书记》卷首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4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页。

③(清)冯登府:《周郑堂明经传》,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四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4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707页。

部为弼得其《读书记》云。其体仿《提要》，有百餘册”^①，赵之谦跋《郑堂札记》，谓“《读书记》旧归平湖朱氏”^②，都可证实此点。朱为弼字右甫，号椒堂，仕至兵部侍郎、漕运总督^③。朱氏与周氏为同年^④，且在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“相叙于爱山讲院”^⑤，早有交往。在周氏生前的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便已见过《读书记》的一部分内容，并为之作跋曰：“道光八年戊子仲夏，吴兴周郑堂同年来都门，出所著《易》类二册见示，盖其《读书记》之一种也。余适提调繙译科试闱事，公徐得卒读之。其书载所读言《易》之书，自汉魏以至国朝，凡九十餘种，各为考证，加以论断，辞尚简要，而议论纯正，绝无偏执门户之见，诚《易》学之津梁也。”^⑥对《读书记》颇为推崇，故愿在周氏身后收其全稿。汤纪尚《周郑堂别传》谓《读书记》“或言后归德清戴望”^⑦，并不准确。戴氏作为周氏外孙，明言“其《札记》未亡，后归诸望，余书无可问者”^⑧，赵之谦亦谓“戴君子高，先生之外孙也。求先生遗书，仅得《札记》五卷，更历患难，守之弗失”^⑨。可见戴望所得者乃《郑堂札记》，《读书记》稿本仍当以归朱为弼为是。
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朱为弼卒，《读书记》稿本大约在其身后散出。赵之谦谓：“庚辛乱后，闻为粤东钜公某取去，遂不得见。”^⑩此所谓庚辛，或以为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至二十一年（1841）^⑪，即鸦片战争时期。但清末人言“庚辛之乱”，多指咸丰十年（1860）至十一年（1861）。如缪荃孙为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所作序文，谓“庚辛之乱，于兵火中扶持文澜阁书，俾出于险”^⑫，即指此段时间而言。此时太平天国攻占杭州，略地东南，诸家藏书佚出颇多，《读书记》稿本之流散，更可能是在这一时期。得此本之“粤东钜公”即原籍广东丰顺之丁日昌，

①（清）戴望：《外王父周先生述》，《郑堂读书记》卷首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4册，第2页。

②（清）赵之谦：《跋》，《郑堂札记》卷首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页。

③（清）刘履芬：《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兵部侍郎漕运总督朱公墓表》，《蕉声馆集》卷首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01册，第388页。

④按：刘承幹《〈郑堂读书记〉跋》谓周氏“嘉庆辛酉选拔贡生”，刘履芬《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兵部侍郎漕运总督朱公墓表》谓朱氏“嘉庆五年举庚申科乡试，先是，学使者试秀才高等，拟中明年辛酉科拔贡生”。清乾隆后拔贡逢酉年举行，得中者与本科举人可互认同年，朱氏称周氏为同年者以此。戴望《外王父周先生述》谓周氏举拔贡在嘉庆元年，实不确。

⑤（清）朱为弼：《周郑堂同年中孚读书记易类跋》，《蕉声馆集》卷五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01册，第520页。

⑥（清）朱为弼：《周郑堂同年中孚读书记易类跋》，《蕉声馆集》卷五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01册，第520页。

⑦（清）汤纪尚：《周郑堂别传》，《续碑传集》第5册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，第198页。

⑧（清）戴望：《外王父周先生述》，《郑堂读书记》卷首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4册，第2页。

⑨（清）赵之谦：《跋》，《郑堂札记》卷首，第1页。

⑩（清）赵之谦：《跋》，《郑堂札记》卷首，第1页。

⑪吴超楠：《〈郑堂读书记〉研究》，河北大学硕士论文，2013年，第16页。

⑫（清）丁丙：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7册，第157页。

研究者已经指出^①。而此本之归于丁氏,可能与嘉兴人戴德坚有关。今见剑桥大学藏稿本《读书记》首册中,夹有红色签条一张,其文曰:

舍侄寄来《郑堂读书记》样本二册,敬呈台鉴。周君似乾嘉时人,书似草稿。如无刊行本,则存之亦佳事也。此上大人台右。丙荣谨启。

文中署名“丙荣”者即戴德坚。戴氏字礼庭,《光绪嘉兴府志》有传,谓:“岁贡生,候选训导。文名噪甚,归安吴云延课其子承潞,承潞旋举进士,任太仓州,洊升按察使。永康应宝时观察苏松,聘司记室。飞书驰檄,词旨华赡。又工书,学颜平原,诗纯学老杜,浑厚沈雄,一时罕匹。”^②按吴云《两叠轩尺牍》有致戴氏信,题“戴礼庭司马丙荣”^③。《莫友芝日记》于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提及“戴礼庭丙荣”,称为应宝时之友人^④。一一皆与传合,可知“丙荣”即戴德坚无疑,丙荣或是其号,或其别名,则不可考。戴氏与丁日昌有交往^⑤,盖《读书记》稿本即通过戴氏之手转归丁氏。戴氏约卒于同治五年(1866)^⑥,故此本之归于丁氏当在此之前。但此时已非全帙,故莫友芝为丁日昌所编《持静斋书目》即载:“《郑堂读书日记》稿本三十四册,抄本,国朝周中孚撰。”^⑦又在《宋元旧本经眼录》中详记此本曰:

《郑堂读书日记》,稿本。国朝乌程周中孚撰。盖嘉、道间人。读一书必为解题一篇,条其得失。议论颇能持平,亦好学深思之士也。凡三十四册,约存七十卷。经部编十四卷,诸经皆略具,唯缺《易》及小学、雅故、字书。史部二十二卷,子部三十三卷,尚无大缺逸。集部则仅本朝二卷。计亡逸当十之二三,不知更有副本否?乱后益无从访求矣。^⑧

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所载略同^⑨。从莫氏的记载中,可知丁氏收之《读书记》,已是仅存三十四册七十一卷的残本,其余部分可能在战乱中散佚。王澐《续补藏书纪事诗》谓“藏弃经部朱善旂,易类跋尾菽花芎”^⑩,朱善旂即朱为弼之子,所言实际还是《读书记》自朱家散出前之事,未必散出后经部残稿仍留其家。

①吴超楠:《〈郑堂读书记〉研究》,第16页。

②(清)赵惟崧:《光绪嘉兴县志》卷二十五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浙江府县志辑》第15册,上海书店,1993年,第587页。

③(清)吴云:《两叠轩尺牍》,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27辑,文海出版社,1968年,第217页。

④(清)莫友芝:《莫友芝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4年,第185页。

⑤柯愈春: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599页。

⑥莫友芝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记:“平斋十一书至,言戴礼庭、蒋剑人相继下世。”见《莫友芝日记》,第202页。

⑦(清)丁日昌:《持静斋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231页。

⑧(清)莫友芝:《宋元旧本经眼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78页。

⑨(清)莫友芝撰,傅增湘订补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451-452页。

⑩王澐:《续补藏书纪事诗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年,第154页。

稿本《读书记》归于丁日昌后,大约随丁氏晚年解官归籍而前往广东。丁氏于光绪八年(1882)去世,身后藏书逐渐散出。光绪十三年(1887),张之洞在广州创设广雅书局,刊布经籍,稿本《读书记》估计在此之后即归于书局。其时本拟刊刻,且曾清抄一部,后刘承幹刻《读书记》时,以“本多漫漶,复假王雪岑廉访广雅书局本校之”^①,所说广雅书局本当即指清抄本,今存天津图书馆^②。但终因其为残稿而未刻。辛亥革命后,原广雅书局提调王秉恩携稿本《读书记》至上海,约在1915年左右售于刘承幹。汤中《宋会要研究》详记其事曰:

辛亥革命,王流寓海上,彼尝负债于洪尔振。民国四年冬,洪追索甚急,王无以应,朱孝臧与王为邻,出而调停,议以书籍作抵,洪以书无受主辞。时刘承幹方广罗群籍,朱因劝刘买王之书,计《宋会要》、《郑堂读书记》两钞本,代价二千四百元。^③

汤氏此书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,距刘承幹买入《读书记》不久,且与刘氏有私交,所记当得其实。刘氏自记其得稿本《读书记》的过程云:“是编初归朱椒堂侍郎,稿本百餘册,后归洪鹭汀观察,观察复以归予。”^④未提王秉恩事,只说得自洪尔振,可能有所避讳,比较之下,仍以汤氏所记较为合理可信。

在抗战全面爆发并波及上海之前,《读书记》稿本应一直藏于刘承幹嘉业堂。周子美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,编为《嘉业堂钞校本目录》,其中即著录有“《郑堂读书记》七十一卷,清周中孚著,旧抄稿本,三十六册”^⑤。可见彼时尚在。抗战爆发后,嘉业堂藏书散出,约在1949年,被剑桥大学教授哈澜(Gustav Haloun, 1898-1951)购得。哈澜或译哈隆、霍古达、夏伦等,出生于前捷克斯洛伐克,先后在布拉格大学、德国哈雷大学、哥廷根大学任教,1938年起,在剑桥大学担任中国学教授^⑥。1949年,哈澜申请得六千英镑购书经费,并亲自前往中国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处,购买汉籍上万册^⑦,《读书记》稿本即在购入之列。今见稿本《读书记》,卷中尚夹有当时旧书店在空白发票背面所写签条:“《郑堂读书记》,七十一卷,三十六册。”卷端钤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与“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949”,可知其自嘉业堂散出后,即于1949年入藏剑桥大学。

①刘承幹:《跋》,《郑堂读书记》卷末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5册,第236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总目·史部》第8册,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4949页。

③汤中:《宋会要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1932年,第54页。

④刘承幹:《跋》,《郑堂读书记》卷末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5册,第236页。

⑤周子美:《嘉业堂钞校本目录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6年,第40页。

⑥黄长著等编:《欧洲中国学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5年,第840-841页。

⑦朱玉麒:《古斯塔夫·哈隆与剑桥汉学》,《国际汉学家研究通讯》第三期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303页。

二、南京图书馆藏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辨析

剑桥藏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因远隔重洋,多不为人所知。相比之下,学界较为了解者,当属南京图书馆另一稿本。此本于清末民初时,为上海藏书家谢光甫所得,谢氏逝世后藏书拍卖,学者周连宽曾亲见此书,谓“此稿本即《郑堂读书记》原稿”^①。其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该本,即径作“《郑堂读书记》不分卷,清周中孚撰,稿本”^②。近年来学者崔欣在目验该本的基础上,又提出:“南京图书馆藏的所谓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,其实是清人梅益徵所编的《得一阁藏书志》。”^③诸说纷纭,值得加以辨析。

今见此稿本存四十八册,各册书衣均题“得一阁藏书志”。卷前有《得一阁藏书志叙》,目录及凡例四则,目录题“上海梅益徵复斋氏编纂”,凡例题“梅益徵复斋氏拟定”。第四十八册卷端钤有“梅氏复斋珍藏”、“复斋梅氏珍藏”、“复斋漫士”等印。目录所列四部俱全,而稿有残缺,尤以集部为甚,仅存唐别集一册。梅氏生平,史籍中记载很少,仅《民国上海县续志》有传云:

梅益徵,字复斋,家富藏书,遇有善本,手自雠校,积数十年,成《得一阁藏书志》四十二卷,皆手写稿本。惜其后人不善收藏,蠹蚀强半。自称所藏有宋槧本及名人手钞之书,不知今尚存焉否也。姑志于此备考,且不没其生平劬书之功。益徵,嘉道时人。^④

梅氏藏书今尚有部分可考者,如莫友芝曾见其藏宋万玉堂刻本《太玄经》等^⑤。但尽管如此,却不能据这些记载,断定南图藏稿本即是梅氏藏书志,其故有二:

第一,此本卷前有嘉庆二十三年(1818)伍有庸《得一阁藏书志叙》,但其内容与伍氏为另一上海藏书家李筠嘉所作《古香阁藏书志序》几乎完全一致,仅将序文中李氏之名换成梅氏。如《古香阁藏书志序》称:“上海李筍香先生,少而好古,家有藏书,犹复遐搜广购,不吝重价,积四十年,得五千余种,缣帙锦贲,以所居古香阁贮之。”^⑥《得一阁藏书志叙》即将“李筍香”改作“梅复斋”,而又忘记将李氏藏书楼名“古香阁”改成梅氏“得一阁”,致使前后抵牾,作伪之迹显然。

第二,梅氏曾编订与抄录过一批典籍,如《民国上海县续志》载“《续泉志》十六卷,陆虎岑撰,梅益徵补正”^⑦,上海图书馆今藏有梅氏抄本《钱录》等。这

①苦竹斋主:《书林谈屑》,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》丁编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641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404页。

③崔欣:《〈慈云楼藏书志〉考》,复旦大学硕士论文,2006年,第27页。

④吴馨:《民国上海县续志》卷三十,民国七年(1918)上海南园志局刻本。

⑤(清)莫友芝撰,傅增湘订补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第596页。

⑥崔欣:《〈慈云楼藏书志〉考》,第45页。

⑦吴馨:《民国上海县续志》卷二十六。

些典籍在此稿本中多有著录,但其提要并非梅氏口吻。最为明显者,当属第二十册史部地理类《沪城备考》提要:

《沪城备考》六卷,写本。国朝褚华撰。华字文洲,上海人。文洲以吾邑旧志讹误遗漏,二者厥弊惟均,因撰是书,以订讹补遗。凡核实一卷,补遗二卷,订误策要杂记各一卷,大都补正人物者居十之七八,而流于小说家言者亦复不少。嘉庆间新修县志,颇采用之。梅益徵复斋识其后。

如此提要出自梅氏之手,当言“余识其后”,无论如何不会说“梅益徵复斋识其后”。从以上两点来看,此稿本并非梅益徵《得一阁藏书志》,书衣所题与卷前序文、凡例等,盖皆出自书贾作伪,不足为据。

但另一方面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等指此稿为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,也有不妥之处。此点可从该稿第三十七册中,子部谱录类《水蜜桃谱》提要反映出来。其文曰:

《水蜜桃谱》一卷,慈云楼刊本。国朝褚华撰。吾邑水蜜桃以甘而多汁,故名水蜜。其种或云自燕,或云自汴,疑莫能明也。前明时出顾氏露香园中,今则几盈一邑。其佳者以余家吾园为最,其次产右营游击署北,与露香园接壤,下者产西门城壕及诸处散种者。文洲撰为是谱,凡二十三则,剖晰种类,体验生植,简而有法,质而不俚,洵足以追踪莆阳之《荔枝谱》矣。余亟付诸梓人。卹寄徐伯云文述序之,蒋□□超曾跋其后。

此提要中所谓“余亟付诸梓人”,并非周中孚的口吻,而是上文提及的李筠嘉。李氏与褚华有交往,并在其身后刊行《水蜜桃谱》,故陈文述谓:“吾园主人光禄李君以园桃见饷,且卹书一册,曰:此亡友褚文学所辑《水蜜桃谱》也……光禄珍此秘文,将付剞劂。”^①又所谓“余家吾园”,也是李氏自称,《水蜜桃谱》谓“今桃之最佳者产黄泥墙李氏吾园”^②可证。如此稿为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,则不应作李筠嘉口吻。今《郑堂读书记》即将“余家吾园”改作“李氏吾园”,“余亟付诸梓人”改作“李筍香取以付刊”^③,可为佐证。

此外,将南图与剑桥大学藏稿本加以对比,也可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。以经部孝经类为例,南图藏稿本于该类首列《御注孝经》与《御纂孝经集注》,正合于李筠嘉藏书志“其每卷之首,恭列钦定诸书,尊王之义也”^④的体例。而剑桥藏稿本,则按著述时间顺序排列于第二十、二十一位,与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合。又南图藏稿本未收阮福《孝经义疏补》一书,这应是由于该书成于道光九年(1829),而据学者研究,周中孚于道光八年已经离开李筠嘉处^⑤,故其为李氏所编藏书志,自然无法收录此书,亦可从侧面证实南图藏稿本属于李筠

①(清)褚华:《水蜜桃谱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16册,第259页。

②(清)褚华:《水蜜桃谱》,第260页。

③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4册,第633—634页。

④(清)伍有庸:《古香阁藏书志序》,转引自崔欣:《〈慈云楼藏书志〉考》,第45页。

⑤崔欣:《〈慈云楼藏书志〉考》,第29页。

嘉。而剑桥藏稿本则有之,亦与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合。至于提要具体内容之互异,更是不一而足。例如,《从今文孝经说》《古文孝经说·孝经释疑》《孝经质实》《孝经彙注》四书,南图藏稿本均注明版本为“影钞明刊本”,而剑桥藏稿本与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均作“明刊本”^①。《孝经郑注》提要,南图藏稿本至“此则不知其伪而扶持之者矣”止,而剑桥藏稿本与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此下尚有“近焦里堂《雕菰集》有《刊日本本郑注孝经议》”云云一段^②。可见,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,南图与剑桥所藏稿本均存在较大差异,前者更表现出李筠嘉藏书志的特征,而后者则更接近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。这也充分说明了南图所藏者并非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。

总之,南京图书馆所藏此部稿本,既非梅益徵《得一阁藏书志》,亦非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,而应该是上海藏书家李筠嘉的一部藏书志稿本。李氏藏书志今传者有二,即较为早出之《古香阁藏书志》与较晚之《慈云楼藏书志》,此本疑出自二者之间。今见《古香阁藏书志》著录《东坡易传》,先用《津逮秘书》本,后因其讹脱过甚而改用《学津讨原》本,至《慈云楼藏书志》又改用明刻本^③。此本在版本方面著录《学津讨原》本,与《古香阁藏书志》同,而提要内容却更接近于《慈云楼藏书志》,据此即可推测此本当是从《古香阁藏书志》到《慈云楼藏书志》间的过渡之作。李氏藏书志多由周中孚所代修,此本当亦出周氏之手,但不能指为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。相比之下,仍以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本流传有序,信而可徵,可称《郑堂读书记》之唯一传世稿本。

三、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与刻本之异同及其价值

刘承幹于1915年得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后,随即将其收入《吴兴丛书》,于1921年刊行,此书方大行于天下,刘氏之功自不可没。但其在编刊的过程中,出于全书前后体例统一的目的,对稿本的文字作出了一些调整,且刻印亦不能无误,故刻本与稿本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。此外,稿本还有多处增删,可以考见周氏撰述《郑堂读书记》之过程,可谓具有其独特价值。

首先,稿本有多处文字可正刻本之误。通过将二本对校,仅经部孝经类一卷,即有刻本误而稿本不误者六七处。例如,《孝经郑注补正》提要,刻本曰:“国朝洪颐煊撰。颐煊字旌贤,号筠轩,临海人,乾隆辛酉拔贡生。”^④稿本“颐煊字旌贤”以下皆用墨笔勾去,但犹能见“乾隆”作“嘉庆”。按,嘉庆辛酉为嘉庆六年(1801),洪氏中是年拔贡,见于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传》等多种资料记载^⑤。

①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8-10页。

②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4页。

③崔欣:《〈慈云楼藏书志〉考》,第10页。

④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4页。

⑤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3411页。《清史列传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5598页。

而乾隆辛酉为乾隆六年(1741),洪氏生于乾隆三十年(1765)^①,彼时尚未降生,故知稿本作“嘉庆”是。又如《孝经大义》提要,刻本曰:“前有大德乙丑熊禾序。”^②稿本“乙丑”作“乙巳”。按,大德无乙丑,乙巳为大德九年(1305),查《通志堂经解》本《孝经大义》,卷前熊禾序题“时大德之九年”^③,正与稿本合。又如,《孝经注疏大全》提要,刻本曰:“国朝叶铃撰。”^④稿本“铃”作“钤”。此书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均有收藏,各家著录作者皆作“叶钤”^⑤。此外如《孝经郑注》提要,刻本“故唐初以前本正称郑氏注,而不加以汉字也”,稿本“正”作“止”;“惟原刻经注,字句之下多有点乙,译其意义,考为便于蒙诵而设,无关经义”^⑥,稿本“考”作“殆”。均较刻本为优。可见在校勘方面,稿本颇值得参考。

其次,在作者的仕履方面,稿本与刻本存在着明显差异。按《郑堂读书记》之体例,作者仕履凡已见前者,后文再遇同一作者之著作,则仕履一般不再重出,仅注明见某部某类。然而,今见刻本中很多排序在前的作者仕履完备,而稿本却将其略去。仅位居全书之首的经部孝经类一卷,属于此类情况者,即有孔安国、洪颐煊、陆德明、司马光、吴澄、姚舜牧、黄道周、李光地、毛奇龄、姜兆锡十人。例如,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提要下,刻本著录作者孔安国之仕履曰:“安国字子国,孔子十二代孙,武帝时,为博士,官临淮太守。”^⑦而稿本则作“安国仕履见书类”。余皆类此。其中洪颐煊、姚舜牧、姜兆锡等人,稿本中本有其仕履,与刻本大致相同,后勾去而改为“仕履见某类”的形式。而孔安国、司马光等人,稿本中原无其仕履,其“仕履见某类”之文乃后补入。由此可见,在作者仕履互见的问题上,周中孚应是出于统一全稿体例的目的,作了全面修改,并非率意为之。但其后稿多散佚,如经部易类等甚至全佚,稿本中某人仕履见易类之文便无着落,又部类排列可能亦有错乱。为避免前略后详、失于照应,故刘承幹在刊刻时作了一些修改补充,由此导致了稿本与刻本的差异。

稿本与刻本在作者仕履上的差别,虽然微小,但却颇具意义。一方面,可以据此探究《郑堂读书记》部类排列的情况。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将孝经类列为经部之首,研究者多以为周中孚之创举,如吴超楠即谓:“在目录中将孝经类置于经部之首,《郑堂读书记》还属先例。”^⑧并进而提出,此举与周氏对学术门径

①陈鸿森:《洪颐煊年谱》,《“中央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,2009年第4期,第693页。

②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6页。

③(元)董鼎:《孝经大义》,《通志堂经解》第14册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3年,第399页。

④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12页。

⑤《中国古籍总目·经部》,第708页。范邦瑾: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49页。

⑥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4页。

⑦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2页。

⑧吴超楠:《〈郑堂读书记〉研究》,第32页。

的认识及当时的学术风气有关。但今见稿本孝经类,对作者仕履多略去,如其原本就排列于经部之首,必无省略之理。由此可见,孝经类在《郑堂读书记》原本中,可能并非经部首位。盖稿本流传既久,次序混乱,刻本因而未改。研究者据此立论,实有过度解读之嫌。另一方面,还可以据此考知《郑堂读书记》佚稿的一些情况。例如,《读书记》本有经部易类,收书九十余种,朱为弼尚曾见之,后在流传中散佚。后人取同为周中孚所撰之《慈云楼藏书志》补之,未必能符合《读书记》之原貌。今见稿本《读书记》,仅孝经类注明作者仕履见易类者,即有陆德明、吴澄、姚舜牧、黄道周、李光地、毛奇龄六人,可知此六人之书,《读书记》经部易类必曾著录。检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,经部易类即无姚舜牧之书。今按,姚氏著有《易经疑问》十二卷,《四库全书》入存目,提要称其“敷衍旧说,实无可取,间出己意,亦了不异人”^①。《郑堂读书记》盖即著录此书。这些内容均有赖于稿本,才能够考得。

最后,稿本尚有一些增删之处,值得加以深入研究。这些增删之处具体又可分三类:

一是增入。刻本《郑堂读书记》中的一些文字,稿本原无,乃后来于天头或文后增入,所增者多为带有评论性质的文字。如《孝经郑注》提要“此则不知其伪而扶持之者矣。近焦里堂《雕菰集》有《勘日本郑注孝经议》,设可疑十二以辟之,其卓识诚非同人所可及也”^②一段文字,稿本即补于天头。《孝经义疏补》提要“虽曰补疏,而实与疏全经者无异矣”^③一句,稿本则补于文末。

二是删去。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中有部分文字后被删去,故其文亦不见于刻本,所删者多为原书序跋或前代目录之成文。如《孝经大义》提要,“其词皆明白而切实”后,原有“熟玩之,则义趣精深,又有非浅见谫闻所能窥者”一句,后删,此句即源自熊禾《孝经大义序》^④。《御注孝经》提要,“为万世教孝之极则矣”后,原有“颁示海内,用端治本而握化源,以视开元御注,度而越之,殆不可道里计焉”一段文字,亦被删去,此则出自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^⑤。

三是修改。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中部分文字曾经改易,方成今日所见之本。这些改易除了统一体例、润饰文字之外,还有一些可能是由于周中孚在撰述过程中,又获得新材料,或研究趋于深入,因而修改。例如,稿本《孝经注疏》提要中,谈及《释文》时,本说:“《释文》一卷,本为郑注而作,因是注多引郑注,聊取以分附经注之下,而是本亦因之。”后加入相台本、监本、毛本的情况,改成“宋相台本因是注多引郑注,聊取以分附经注之下,而明监本、毛本及是本亦因

①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2003年,第59页。

②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4页。

③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6页。

④(元)熊禾:《孝经大义序》,《孝经大义》卷首,《通志堂经解》第14册,第399页。

⑤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124页。

之”^①。可见周氏初撰此提要时,或未及考察诸本,后追考而作修改。又稿本《孝经会通》提要,著录该书的版本原为“写本”,后改“明刊本”^②,可能是周氏后见此书较佳之版本,因作修改。

从以上的增删之处,可以看出两个问题。一方面,稿本《郑堂读书记》虽非一字不改的写定之本,但其主体内容大致皆已成型,没有大段涂改甚至全篇提要另作的情况,可能是周氏晚年所定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本子。刘承幹乃至怀疑此为传抄之本,非周氏稿本之旧^③。然而,今见稿本中对字句的局部增删修改,仍不一而足,此非周氏不能为之,故刘氏之怀疑未必能成立。另一方面,周氏在撰述《郑堂读书记》时,似乎有意识地加入自己的见解,同时删去引自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等他书的内容。这在一定程度上,反映出周氏不愿墨守官方目录之成说,或抄撮序跋之成文,而更希望断以己意,以成一家之言的倾向。与同为周氏所修的《慈云楼藏书志》“一以《四库提要》为宗法”^④的态度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对研究周中孚之撰述宗旨颇有帮助。

作者简介:谢辉,男,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历史文献学。

①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5页。

②(清)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,第7页。

③刘承幹:《跋》,《郑堂读书记》卷末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5册,第236页。

④崔欣:《〈慈云楼藏书志〉考》,第45页。